

# 定位文化研究及本書

## 目次

- 壹、文化研究中的對立意見 /5
- 貳、協調 /7
- 參、本書架構 /11

3

本書論點之一是研究或研究方法論絕非「客觀的」(objective)，反而總是受到特定的社會位置、歷史事件及其議題所定位和指引。因此，為了定位本書，必須知道本書是源自於早期我對飲食失調(eating disorders)的論述及生活體驗(lived experiences)的研究。大致而言，飲食失調是女性的精神困擾，其特點是為了追求瘦身而甘冒危險。我原先被迫研究這些狀況，是因為我本身即罹患厭食症，我對這些狀況被人透過以下兩種角度來研究而感到質疑或甚至憤怒。第一種研究角度是認為罹患厭食症的女性是「失調的」(disordered)，甚至無法評估本身의思想和行為，我對這種研究方式大感不滿。在許多研究中，厭食症患者所說的話僅被視為是一種「症狀」，其中「真正的」意義(例如心理或社會病理的意義)都可由

精神分析師甚或女性主義文化評論家等專家來解讀。第二種角度則將厭食症患者視為代表了某些社會、政治策略與論述，而明顯並未意識到厭食症患者狀況的「意義」或根源，對此我也不敢苟同。一直以來，對厭食症的解釋很容易使批判者注意到身體理想與家庭結構的性別歧視本質，以及(後)現代自我控制的失能(dysfunctionality)。此外，對厭食症的解釋也常對厭食症患者，或一般女性天生的病態本質言之鑿鑿，視女性為虛榮、過度依賴他人及他人意見，並經常助長了普遍的社會服從與保守主義之聲勢。

因此，受到這兩項我所關切的問題驅使，我開始著手一項研究計畫，這項計畫旨在發展出一些方式，來公正評論關於厭食症的生活體驗，並批判性地分析組成這種經驗的相關論述。然而，我與罹患厭食症的女性進行的訪談雖然包含了許多具挑戰性且有趣的深入見解，但這些訪談還是以厭食症的醫學概念為基礎，這些概念問題重重，也正是我想批判的對象。由此我遭遇到第一個方法論上的問題：一個人要如何公正評論人們的生活體驗，但同時又具批判性地分析那些形塑我們所經歷的論述？

- 4 再者，我針對飲食失調相關論述的分析，帶領我進入始料未及的境界。研究當代厭食症診斷標準的歷史，促使我進而研究一九二〇年代的美國移民政策，以及戰後或冷戰時期美國的政治、文化與知識脈絡。有些流行偶像導致飲食失調成為家喻戶曉的名詞，例如卡本特(Karen Carpenter)及黛安娜王妃，針對這些偶像的分析，引領我進一步地討論一九六〇年代基進主義與美國前總統尼克森(Nixon)時期新保守主義兩者之間的論戰，之後我則繼續研究我新家園周遭的情況，亦即矛盾的新勞工政治與一九九〇年代英國的氛圍。然而，描繪出厭食症的社會關聯及其定義之後，對我而言，另一項

方法論上的兩難也隨之產生：一個人如何一邊批評建構「真實」的論述(例如厭食症)時，同時又發表關於歷史與政治現實的言論？

最後，個人的憤慨讓我開始探索並引領我去研究二十世紀北美及英國重大的社會與政治過程、發展和架構，這種方式是我始料未及的。研究進行的同時，我必須提出一套架構來研究厭食症的生命、推論及歷史與社會面向，並遊走於不同的方法論觀點及書寫文類中。不同的方法論取徑間常有截長補短之效，但這些取徑也會逐漸造成實際上的困難及理論上的矛盾。本書根據本人以及其他諸多學者的研究，試圖提供一個指南，以引導讀者如何去研究當代實際生活中的體驗和論述，以及社會和政治的本質。我的企圖心是：寫一本在我開始研究之前會想要閱讀的書。

## 壹、文化研究中的對立意見

我的知識信念不僅受到自己的研究影響，也受到文化研究的歷史，以及這種歷史如何在我工作或研究之處發揮作用的方式所引導。目前已成為傳奇的「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在一九七〇年代將文化研究塑造成一門學科。稍後，一九八〇年代，我在芬蘭坦派勒大學(University of Tampere)攻讀第一個學位，並進入文化研究的領域。當時文化研究不再是身處邊陲的學門，反而逐漸躍居主流，並在斯堪地那維亞的學術科系佔有一席之地。因此，即便我攻讀的是一門理應「客觀的」學科(例如新聞學)，然而我修習課程主題仍在意識型態、霸

權、抗拒、後現代性、再現與敘事等方面。我初學時的第一個研究計畫是關於哥斯大黎加另類媒體及芬蘭的年輕佔屋居住(squatter)運動，這些計畫深植於文化研究中的英國部分，特別是其對「抗拒」(resistance)的關注。我和一九八十年代時的同學，以及自己在二十一世紀時代的學生，都喜愛抗拒運動所做的批判及其「歡樂的」光環。在抗拒運動中，

5 我們看到文化中的「希望」，而不像某些悲觀的批判分析認為文化主要只有安撫人心的功能。「抗拒」強調通俗文化的形式，諸如青少年文化及運動中的創意潛能，以挑戰主流意識型態和社會，即便這種潛能不一定被解讀為社會激烈轉變的導火線。

在極早期階段，我對厭食症的研究可能是受到一些厭食症患者抗拒厭食症相關論述的模糊概念所影響，但這些概念很快地就被拋諸腦後。其中有部分是由於我與罹患厭食症之女性的訪談非常複雜，因此無法以屈從於主流意識型態或抗拒主流的角度來描述。再者，對抗拒的研究遭受到越來越多的攻擊，舉例而言，比起其所研究的現象，這些研究被批評為揭露了更多學者的政治幻想，例如對青少年、女性主義、勞工階級、反叛的幻想(Morris, 1990; Nightingale, 1992; Stabile, 1995)。但我認為分析意識型態持續讓人對於生活體驗、文本及脈絡的實證研究產生深入看法，我也認為若不瞭解這些古典取徑，便難以理解文化研究中較晚近的方法論潮流，即使這些研究已不使用古典取徑的語彙，古典取徑仍常會持續支持在典範內進行的研究。基於這些理由，我在本書中花了幾個章節的篇幅，概述用來研究生活及文本文化的意識型態及抗拒取徑，並討論它們的缺點及持續的相關性。

我放棄抗拒典範(resistance-paradigm)的時間點，和我於一九九〇年代，從芬蘭搬到伊利諾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香

檳校區(Urbana-Champaign)攻讀博士學位的時間重疊。當時香檳校區是美國文化研究的麥加聖地，我的論文口試委員會眾星雲集便是例證，其中包括了克里斯金森(Clifford Christians)、柯爾(C. L. Cole)、鄧金(Norman Denzin)、葛羅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與特萊區勒(Paula Treichler)。我的指導教授鄧金當時正在發展詮釋性研究的新模式，以回應來自後殖民主義與女性主義的攻擊。這些理論皆認為社會科學並未能瞭解邊緣族群(例如女性、勞工階級或非西方民族)，而只是將這些族群當作合理化學者政治及理論計畫的工具，從殖民主義到馬克思主義都是學者的計畫範圍(參見 Clifford and Marcus, 1986)。這種新的詮釋性或民族誌研究計畫之目的，在於找出更多合作的方式，以研究及書寫對不同世界有較高敏銳度，並意識到我們的理解有其限制及責任之人(Denzin, 1997a)。同時，我另一位口試委員會的成員葛羅斯伯格也正開始批判社會研究中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並指出我們應該開始注意日漸造成剝削的物質及經濟發展，這些發展因大家對各種文化及經驗的興趣而遭到遺忘(例如 Grossberg, 1998)。在這種情況下，我多少覺得自己在文化研究與實證研究的兩種潮流中拉扯，而文化研究有興趣的若不是個人經驗的微觀世界，便是全球、經濟權力結構的宏觀世界(Saukko, 1998)。

6

## 貳、協調

然而，最近文化研究中實證研究及方法論的討論多少模糊了這些對立意見的界限。原始新民族誌批判的先鋒克力福

特(Clifford, 1997)與馬庫斯(Marcus, 1998a)，再加上其他人(Appadurai, 1997; Haraway, 1997)，已開始論及我們的研究超越傳統典範以及地理界限的方式。舉例而言，這種超越模糊了文化和經濟間的分野，而研究客體能簡單定義的概念也隨之粉碎了，例如次文化或村落等客體。因此，社會學家的年輕人次文化或人類學家的村落似乎不再是可各自分離的場所，而較像是網絡的中心點；跨國媒體、金錢、人、事及形象的各種流動穿越這些中心點，並加以塑造它們。我的研究主題——厭食症，一般視為是一種心理問題，同樣跨越了不同的生活領域及分析層次。因此，當繼續探索我的研究時，厭食症便開始變得極為私密、和個人及人際有著緊密關連，同時又有大量醫學和流行論述夾雜其中，並與廣泛的社會、政治甚至全球軍事制度產生微妙但穩固的連結關係。

我們有時會以千禧年的流行口號——「全球化」來加以描述這種模糊界限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中，經驗、文化及「真實」(或媒體研究中的「閱聽人」、「文本」及「生產」)間的分野越來越不清楚。就某方面而言，這種新的景況帶領我走向其他口試委員會成員的研究興趣領域，也就是科學研究(Cole, 1998; Treichler, 1999)及對話理論(Christians, 1988, 2000)。科學的文化研究一直位於發展混雜方法論的最前線，大致而言，這種方法論可帶領我們超越下列論戰：物質真實是否決定了語言及文化，或是比語言及文化重要；抑或語言或文化決定了真實、或比真實重要。借用哈樂葳(Haraway, 1997)的概念，論述(例如關於厭食症的論述)最好被視為是「物質符號」的力量，這種力量源自於特定的歷史脈絡，並造成象徵性及實質的改變。因此，關於厭食症的論述塑造出我們對於自我最基本的概念，也塑造我們定義何種自我是「健康」及何種自我是「失序」的方式。同時，這種論述也造成特定

的治療制度及生活型態的產生，因而成為流行媒體形象的一部分，也被用來作為解釋社會與政治制度各種形貌的根據。

關於厭食症的論述將這些象徵及實質、在地及全球的面向交織在一起；但每種面向都有其特殊性。一個人的生命史和冷戰歷史也許有所關連，但我們需要不同的取徑去捕捉生命歷史和一般的歷史。從方法論的觀點來看，這造成兩項挑戰。首先，為了瞭解這種經驗的特定面向，我們必須嚴格運用一種適當的方法論。舉例而言，如果一個人想瞭解並傳達一個罹患厭食症女性的獨特之處及其與他人的細微差別，他就必須謹慎參考並運用關於研究、書寫不同生命世界之方式的新民族誌著作。再者，我們必須明白這種獨特之處並非生活體驗唯一具備之物。社會論述(例如醫學定義)以及經驗所處之歷史及社會脈絡也塑造了經驗。然而，為了捕捉這些厭食症經驗的其他面向，我們必須使用不同的方法論取徑及方法，例如論述分析或歷史研究。

對許多研究新手來說，掌握各種類的研究取徑並將它們加以結合，聽起來會令人卻步，這對經驗老道的學者而言也是如此，因為我們所有人都同樣面臨各種時間壓力。任何研究計畫的成功，都有賴於在野心及能夠實際操作的方式之間艱苦地取得平衡。因此，我並不建議所有的研究計畫都結合好幾項觀點。反之，本書不同章節的目標便是強調各種研究方式的特點、優點、可能問題及疏漏之處，將不同的研究方式做一概述，並提倡將這些方式加以結合的最好方法。舉例而言，我希望能多檢視更多絕佳、完美的新民族誌，這些民族誌傳達出獨特或「特殊」生活體驗的微妙結構，同時也為「普世」發言，亦即突顯出我們當代社會世界的一些重大困境。同時，我也要指出我們習慣運用老套故事，將其視為「真實」經驗的問題，一些實驗研究流派及日間時段的談話節目

都會犯上這個毛病，這些故事充滿個人陰謀及對身體的羞辱，例如鉅細靡遺地描述肥胖的可怕(Kiesinger, 1998)。但在討論不同研究取徑時，我不僅想要突顯各取徑的特點，也希望強調這些取徑彼此之間如何產生關連。找出不同研究取徑之間的聚合點(例如研究生命和全球的真實)，是為了指出整合不同取徑的方式，以拼湊出也許更為複雜、細緻的分析，即便我們對於研究現象所進行的分析，決不可能完整。

這種建立不同觀點間對話的需求，最終帶領我到目前的學術家園——李斯特大學大眾傳播中心(Center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t the University of Leicester)。在一九七〇年代，李斯特中心成立，廣大的英國學術社群同時也將該中心塑造成與伯明罕中心文化主義分庭抗禮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科學據點。然而，那樣的日子已經遠去，今日的李斯特大學最為人熟知的，或許便是國際溝通方面的研究，這項研究最近才在全球化一詞的帶動下，有了新的意義。針對「全球」的論述或許帶有一點知識及時興的樣貌，但

8 全球化需要的是當代世界中生命、媒體、宗教、族群、性別、經濟及政治面向之互動分析。同樣地，全球化創造了一個跨學科空間，在其中各種理論及方法論的取徑都能看似和平地共存，這些取徑挑起了對話、論戰，彼此之間也相互借用，並且謹慎地交融。

在整本書中，我強調我們有必要注意文化或知識現象、物質環境及政治制度如何交織。我為本書作最後的技術修訂時，又再一次地想到這些互動的重要性。我修正全書，瞭解到伯明罕文化研究的原始搖籃才剛經過「重新架設」，而由於持續的「重組」，我在李斯特的工作環境也惡化到令人難以想像的地步。即使最近預算的刪減對英國文化及溝通研究的跨學科領域似乎造成不小的打擊，但終點



也往往只是起點。我正準備前往艾希特大學(University of Exeter)，擔任跨學科研究團隊的一分子，以研究基因體的意義。或許和其他新的社會發展相較，基因體更可以開創新方式，以理解、研究物質及文化在個人及社會生活中的連結。對於新的社會現象，我們需要更多(而非更少)方法論上的精闢分析、批判性分析及文化分析；這些新的社會現象可能會挑戰我們關於自我及社會安排的基本意涵。

## 參、本書架構

在開始概述本書架構之前，我希望澄清本書是與「方法論」(methodology)相關，而不是與「方法」(methods)有關。希臘修飾詞「logos」(知識)指出兩者之間的差異，在於方法指的是瞭解經驗真實的特定「工具」，而方法論指的是工具、哲學及政治信念的結合，後者的範圍更廣泛，而且有特定的研究「取徑」。方法和方法論常是如影隨形的，因此企圖「深入」理解他人經驗的詮釋方法論取徑，常伴隨某種研究方法(例如參與觀察)，以便讓學者及研究對象發展出彼此互信的關係。然而，同樣的方法也可以支持不同的方法論信念。因此，訪談法也可以用來支持以收集「真實」資訊為目的之實在論方法論取徑，或支持去徹底瞭解一個人之生命故事的詮釋方法論取徑(參見 Alasuutari, 1995; Kvale, 1996; Silverman, 2001)。

我選擇將重點放在方法論的第一個理由，是因為已有許多講述方法的書籍適用於文化研究(例如 Alasuutari, 1995; Flick, 1998; Silverman, 2001)。但我決定不寫方法的主要原因，是因為許多講述方法的書籍(當然並非全部)以實證主義

的角度，將方法視為介於學者及所研究真實之間的「放大鏡」。我們可以瞭解，如果正確使用這些方法(或鏡片)，或根據指示使用，可以幫助學者更接近「準確」或客觀、無偏見的真实觀點。但本書的基本目的之一，就是探討當我們改變看待真實的研究取徑或鏡片時，真實會如何變化。因此，我不會將「參與觀察」視為一種方法。反之，我會討論「新民族誌」如何試圖公平看待他者的生命世界，也會探討「後結構」的研究取徑如何批判性地分析社會及制度論述，而這些論述交錯於任何生活體驗或世界。新民族誌及後結構的取徑都可能使用參與觀察，但其「觀察」可能截然不同。

然而，儘管這樣的重點可能較廣，我仍然會說本書是一本「使用手冊」。即使我的部分討論可能比一些講述方法的著作抽象，本書目的仍在於提供意見，探討「如何」在每個討論的研究典範間進行研究。但我並非要提供一本講述如何利用科學方法去「客觀」研究社會真實的書。我的目的在於鼓勵對社會現實進行反身性(reflexive)的社會及文化研究，同時瞭解此研究的理論和政治信念，以及其影響、優點及疏漏。最近有一些將焦點放在文化研究「方法論」的實證及理論書籍(McGuigan, 1997; Couldry, 2000; Lewis, 2002)出現，我認為這些書籍的出現代表越來越多人承認我們需要多加反省，我們的研究總是帶來一種片面、政治性的真實觀點。但即使本書並不同意我們應該找出「唯一」真實的「唯一」真相，卻也不提倡相對主義的觀點而認為不同的方法論取徑開啟了多重、無共同標準的「真實」。反之，本書希望激起不同研究世界中使用不同方法論取徑之間的交流或對話，以培育出一種文化研究來瞭解當代全球、社會及個人真實的複雜性及多面向性。

在描繪本書輪廓時，我們是依據「X檔案(X-Files)的公

式」(Lavery et al., 1996)來進行架構，並且是以每章內容皆可獨立閱讀來進行安排，就如同每一集的 X 檔案 都可獨立觀賞一樣。但讀完全書的讀者，仍會比只讀有興趣的特定章節之讀者，能從每一章中得到更多收穫，就如同 X 檔案 的忠實觀眾會比偶爾觀賞的觀眾更「知道」每一集的意義。

本書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由緒論加上第一章組成，我們會討論文化研究方法論的歷史，以釐清「文化」一詞的意義為何，並概述一種「對話」方式，它結合了那些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所會探討的方法論取徑。第二部分討論理解生活體驗的研究取徑。本章概述以「抗拒」的觀點去研究所經歷生命的方式，不僅從現象學或詮釋學新民族誌的角度出發，也從後結構觀點加以研究。現象學或詮釋學新民族誌用以理解他者，後結構觀點則探究社會及制度的論述，如何組成我們的生活體驗及認同。第三部分概述研究文本及論述的方式。本章討論了以「意識型態」及系譜取徑的角度檢視文本的分析模式。上述取徑闡明了我們視為理所當然之現象的歷史本質。本章也概述了德希達的解構分析。德希達的解構分析闡明了深植於文本或論述中潛藏的二元規範，並指出方向，讓解構更有建設性，且不只是能夠批判文化，還能建議其他的社會組織方式。最後的第四部分是本書的結論。本部分的第一章，即全書的第八章將討論關於「空間」的批判性地理著作，探討這些著作如何用來理解全球化的宏觀過程，以及理解這些過程中所隱含的日常生活意義。第九章介紹了幾種進行「多重場域」及「多重分支」研究的方式，這樣的研究結合了生命、推論及物質 / 空間取徑去研究當代社會真實，以捕捉全球與在地、情緒與經濟、詩意與政治的一些面向。

《文化研究取徑：新舊方法論的探索》雖然介紹了文化

研究的古典實證取徑，例如抗拒及意識型態的分析，但卻比較偏向新的取徑，例如新民族誌、系譜學及多場域分析。將重點置於此的理由是因為有許多這個領域的人「進行」這種研究，但卻沒有太多著作會反省這些研究進行的方式，且幾乎沒有任何著作談論我們如何去結合這些研究，以促進文化研究中，不同理論、方法論、實證與政治立場間的對話。